

# 论历代海赋的海洋书写及其知识、观念图景

潘静如

**内容提要** 历代以海为题材的赋体文学创作构成了久远的传统，在递承中显出嬗变，表现为各时代的观念、知识对文本的渗透。汉魏以降，相对于方位、蛮荒、诡怪、神仙等观念或想象的消长，知识的增益乃至反拨一直存在，并在近代全球视域中达到顶点。然而，当晚清士人努力清除“荒谬”的四海观念时，一种新的且错位的四海观念却借助知识的“神圣”与“科学”而得到确立巩固。循此省察，知识并不中立，有时只是观念的伪装；观念也绝不是知识的简单反映，在可能的时候，总是对知识表现出敌意，二者间充满了多层次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 知识；观念；四海；海赋；海洋文学

16世纪至19世纪，海上力量主导了全球秩序。晚清士人视野中的海洋图景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首先是知识层面的，然而根本上乃是观念层面的。从文学史来看，江海书写早见于先秦典籍，但这类书写很少将海洋作为一种审美对象抽离出来。魏晋南北朝之际，诞生了以木华《海赋》为代表的很多同类作品，唐宋以还，承续不绝<sup>[1]</sup>。海洋知识的嬗变与丰富也渗透到相应的书写中，历代的海赋创作展示了这一点。省察这些书写，观念与知识之间有着相当复杂的互动，既相互竞争，又彼此“伪装”。它们是总体性的社会文明的投影。这展示了社会思想史的某种固有机制，尝试去揭示这种机制，是本文的任务所在。

## 一 作为“底文”的知识与观念： 四海及其方位

对水的出色描写，《尚书》《庄子》《山海经》《诗经》《楚辞》《子虚赋》等典籍中颇多其例，但把海洋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细致描写，大致始于东汉。从早期几篇海赋来看，海赋创作都与作者的经历相关。班彪《览海赋》有云：“余有事于淮浦，览沧海之茫茫。”<sup>[2]</sup>班彪当是沿着淮河看到了今黄海。曹丕《沧海赋》没有明确交代作赋缘起与场域，结合他的生平，此篇大约作于他追随曹操东征

乌桓的时候，则所谓沧海或指今渤海。这种切身经历为海赋的创作提供了条件、触发了兴致。在海赋的书写中，实践性的社会知识尽管会被展示出来，然而总是有限的，而且总是被湮没或混淆。这种湮没或混淆很难说全是作者有意为之。海赋作品所书写的“海”是一种奇特组合，有着不同的“底文”：一方面是知识，指向自然的物质之海；另一方面则是种种礼仪性、制度性的观念，且掺杂着想象。作者并不一定自觉地将所有内容都视为虚构性的文学书写，故而不加检视、不求真实。在很多细节上，这是一种超越了虚、实之辨的状态。背后的消息，殊堪寻味。

上举班彪、曹丕两人的海赋作品还较为粗糙、简短。班作仅36句，重点全在游仙；曹作篇幅很小，除了开头夸饰军容之壮外，主要描述麟介物产，很可能是残本。真正为海赋确立了典范的是西晋末的木华，其《海赋》开头有如是形容：

于是乎禹也，乃铲临崖之阜陆，决陂潢而相浚；启龙门之岸嶺，垦陵峦而崭凿。群山既略，百川潜渫。泱泱澹泞，腾波赴势。江河既导，万穴俱流。倚拔五岳，竭涸九州。沥滴渗淫，荟蔚云雾。涓流决壤，莫不来注。於廓灵海，长为委输。<sup>[3]</sup>

这段文字是写江河的。对于有的批评家来说，这样的开头与题目极不相称，“或作九河，乃可用此首，

今却不免孤负大海”<sup>[4]</sup>；对有的批评家来说，“文体原无定，或由本及末，或自末归本”，像这样从江河写起，不涉“拘板”，“流动跌宕，读之固自快然”<sup>[5]</sup>，甚至收到了最好的艺术效果，“起得突兀，先从众水说来，方及海，甚奇”<sup>[6]</sup>。但站在另一个角度，这段文字显示木华《海赋》书写海洋，颇基于实践性的社会知识。木华从大禹写起，相关文字的内容颇近《禹贡》。《禹贡》所记载的中国水道、山脉都是非常精确的，像“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sup>[7]</sup>等表述，都是引导木华从江河写起的重要因素。《海赋》在别的地方也显示了类似信息：

尔其为大量也，则南浚朱崖，北洒天墟，东演析木，西薄青徐。<sup>[8]</sup>

“西薄青徐”谓海的西界在青州、徐州一线。这可以对照《禹贡》“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sup>[9]</sup>等文字。可知木华《海赋》写的就是泛东海，上文提及的班彪、曹丕莫不如此。再比如：

群溪俱息，万流来同。含三河而纳四渎，朝五湖而夕九江。（潘岳《沧海赋》）<sup>[10]</sup>

禹启龙门，群山既凿……灌注百川，控清引浊。始乎滥觞，委输大壑。（庾阐《海赋》）<sup>[11]</sup>

五湖同浸，九江丛溉。抱河含济，吞淮纳泗。南控沅湘，西引泾渭。（孙绰《望海赋》）<sup>[12]</sup>

这些文字也都表明，他们之所书写，与木华一样，乃是泛东海，依据的是实践性的社会知识。

但木华《海赋》还写到了大海的“出日入月”：“大明攄轸于金枢之穴，翔阳逸骀于扶桑之津。”<sup>[13]</sup>李善注指出“翔阳”即太阳，“大明”即月亮。孙月峰曾提出不同看法，谓：“大明即是日，无容曲解。一入时，一出时，用以作对，故作两呼耳。”<sup>[14]</sup>“大明”确实有训作太阳的例子<sup>[15]</sup>，但此处恐怕还以李善注为是。这两句写的是西边月落，东边日出。这可从后世海赋的互文本加以验证：

越汤谷以逐景，渡虞渊以追月。（张融《海赋》）<sup>[16]</sup>

浴阳乌于东津，没望舒于西溘。（卢琦

《海赋》）<sup>[17]</sup>

漾玉兔之精华，隐金乌于玄默。（刘守元《曙海赋》）<sup>[18]</sup>

出日入月兮八紘穿。（洪翼圣《海若赋》）<sup>[19]</sup>

张融、卢琦、刘守元、洪翼圣的海赋，也都明确表达海洋“出日入月”之意。泛东海的西岸在青州、徐州南北一线，不可能是月落之地。这就意味着木华在《海赋》写作的过程中，突破了泛东海的实践知识，而被“四海”观念所牢笼，写到了他未曾见过的“西海”。日出的是东海，月落的则是西海。木华《海赋》的“东演析木，西薄青徐”就成了一种障眼法。因为如果我们要去写四海，也应该是卢琦这样的写法：

东接扶桑，西逾弱水，北洗沃墟，南激珠厓。珠厓之外，不知其几万里。<sup>[20]</sup>

看上去，卢、木二赋的表述别无二致，但有一个致命差异。卢赋将木赋中的“西薄青徐”置换为“西逾弱水”，明白交代了“西海”的存在。这样，卢赋后面的“浴阳乌于东津，没望舒于西溘”才变得顺理成章。木华的书写则存在着逻辑上的空白。

这就是说，木华《海赋》以社会知识的海为书写对象，却在当中暗暗掺入了观念性的想象，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大海的不可端倪，就像张融、柳宗元说的：

东西无里，南北如天。（张融《海赋序》）<sup>[21]</sup>

今夫大海，其东无东，其西无西，其北无北，其南无南。（柳宗元《东海若》）<sup>[22]</sup>

这些叙述显示了大海的浩瀚迷茫，人置身其中，方向、方位的识别几乎不可能。从知识论的角度讲，这种体验的获得，只要一片真实的海域就可以。在逻辑上，它与“四海”全不相干。不过，这种局部海域的浩瀚迷茫体验，仍然会影响到我们的书写。只要是关于海的浩瀚的夸饰，我们就难以察觉，一种笼统的观念就得以堂而皇之地寄寓其间。另一方面，则与我们礼仪性乃至制度性的“四海”观念相关。《尚书·大禹谟》云：“文命敷於四海，祇承于帝。”<sup>[23]</sup>《中庸》云：“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sup>[24]</sup>这个四海是礼仪性乃至制度性的观念，表征着天下秩序，但又不完全是虚设的。所以《尚书·益稷》亦谓：“予决九川，距四海。”<sup>[25]</sup>

《孟子·告子下》云：“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sup>[26]</sup>由此，“四海”与九川相勾连，被默认为近乎实有。

秦汉以后，一些士人对南海才有了相当程度的认识，譬如三国吴使者康泰，东晋僧法显，南北朝僧智严、法勇、道普等人<sup>[27]</sup>。但这些认识没有沉淀为一般性的社会知识，也很少对社会观念形成根本性的挑战。唐徐坚《初学记》各类目有“叙事”部分，在功能上近于现代辞典。像“按东海之别有渤澥，故东海共称渤海，又通谓之沧海”<sup>[28]</sup>，“按南海，大海之别，有涨海”<sup>[29]</sup>就都是知识性的，前者指出渤海只是泛东海的一部分，称呼上可以互相指代，后者指出谢承《后汉书》所谓的“涨海”即是南海。与此同时，“叙事”仍引用了《释名》“海，晦也，主引秽浊”<sup>[30]</sup>、《博物志》“七戎、六蛮、九夷、八狄……谓之四海”<sup>[31]</sup>这些观念性叙事，《博物志》《列子》《山海经》的神山、荒怪之说更是悉数列入其中。最妙的是，“叙事”中又有按语云“按西海大海之东，小水名海者，则有蒲昌海、蒲类海、青海、鹿浑海”<sup>[32]</sup>，完全没提及“西海”有类似东海之“渤海”、南海之“涨海”那样的局部海域，可以互相代称，只狡黠地说“西海”的东面有一些“小水名海”者。这种审慎、模糊兼而有之的按语形态，肯定囿于时代知识，但如果我们追问下去，这可能还是一个意识的问题。

事实上，如果某一类型的叙事有破绽，那么一定出现得很早，不管它多么细微。回到《禹贡》那里，有这样几句：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讵于四海。<sup>[33]</sup>

这段文字只涉及了泛东海，所谓“东渐于海”，并没有提及西海、南海或北海，相反，它倒是提到了“西被于流沙”，所以这段文字的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朔南暨声教，讵于四海”却并不是记录性的文字，而是富于张力，把一切观念与想象以一种无懈可击的方式带进来。它把修辞学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致。随着后人实践的加深，知识越来越咄咄逼人。洪迈《容斋随笔》云：“北至于青、沧，则云北海，南至于交、广，则云南海，东渐吴、越，则云东海，无由有所谓西海者。《诗》、

《书》、《礼》经所载四海，盖引类而言之。”<sup>[34]</sup>承认了西海并不存在，只是儒家经典的“引类而言之”。细读这段文字，还可以发现，“东海”范围变小了，缘故是洪迈将一部分泛东海的海域分给了所谓“北海”。看上去言之成理，但是“青、沧”沿线的海域绝不是过去观念或想象中的那个北海。即使是洪迈，也只作了有限的省察。程大昌《北边备对》云：“禹迹所及，西境流沙而极，不言西海，东北尝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于经。则谓‘外薄四海’，‘讵于四海’者，如之何而四也？”<sup>[35]</sup>出于尊经，程大昌在驳斥旧说之余，还是试着给出了自己的新说。虽然如此，很明显经文是有疑点的。与此可以互相发明的是，宋代《禹迹图》石刻展现了中国疆域的细节，地图上有5000多个方格，每个方格的边长大约是实际的100里，绘图比例约是1:4500000，李约瑟推为“远超过西方”<sup>[36]</sup>，引起了西方学者的赞叹与膜拜<sup>[37]</sup>。这意味着当时国人对东南疆域的认知很确切。但是，这尊石刻的背面是一幅《华夷图》，没有精心筹算的网格，海岸线很模糊，河流水系也不准确。这种反差耐人寻味。《禹迹图》展示了宋人实践性的社会知识，《华夷图》则不是，它更多是一种想象、一种观念。形之于图，当然不必也不可能精确，写意就足够了，而且恰如其分。同一个疆域，石刻的正、反面居然有如此大的差异乃至错谬，这种内在矛盾是一望而知的，但却好像并不存在问题，没人去理会，包括地图的绘制者、碑石的刻泐者。因此，与其考察当时的社会知识够不够检视或纠正观念，不如去设想他们愿不愿。愿不愿这种表达也不准确，因为仿佛他们要做出选择似的；在大多数时候，连愿不愿都不存在。观念与知识的暧昧统合不仅仅是知识的程度问题。

与《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讵于四海”这种处理相类似，木华《海赋》“尔其为大量也，则南逾朱崖，北洒天墟，东演析木，西薄青徐”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他所书写的是一个触手可及的泛东海，他从未提及要写“西海”。然而，正如上文交代的，《海赋》已然把西海纳入了书写范围，但我们之所以看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从逻辑上作了严密推导。木华或古代的任何读者

往往并不预设什么逻辑。由此，四海观念得以隐藏其中，混入表面上所书写的实际海域之中。现代研究者会辩解说，古人“北海”指的是贝加尔湖，“西海”指的是青海湖甚至阿拉伯海、红海，因此都有依据。这是忽略了古人所谓四海乃是观念与知识的结合体，并不是纯粹的实践性知识。就个体而论，古人并非没有怀疑；就社会而论，则观念的力量要久远得多。康熙间敕纂的《古今图书集成》有云：“水大至海而极。从古皆言四海，而西海、北海远莫可寻，传者亦显确据，惟东海、南海列在职方者，皆海舶可及。”<sup>[38]</sup>这种斩捷的叙事，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才得以形成的。

## 二 蛮荒、诡怪与神仙

所谓四海，与《尚书》《礼记》《尔雅》《博物志》甚至《山海经》的叙事息息相关，是一种关于礼仪与文明的想象。它隐藏着蛮荒、诡怪诸如此类的预设。木华《海赋》写道：“乖蛮隔夷，回互万里。”<sup>[39]</sup>“乖蛮隔夷”正是海的结果。这不会轻易因实践性的知识而淡化乃至消除。

在木华所处的西晋，“江表”经过古吴越、两汉与孙吴政权的建设，早已不再是“蛮荒”。但对于中原人士而言，这里仍带一点蛮荒印迹。二陆入洛被轻视，绝不仅仅因为他们是“亡国”之人。《世说新语·言语》云：

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sup>[40]</sup>

蔡洪是吴郡人，他入洛也有相似遭遇。洛中人说的是“吴、楚之士，亡国之余”，但蔡洪完全没有纠结于“亡国之余”，而是斤斤于“吴楚之士”，这才搬出“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来作为反击。在这次交锋中，彼此的重点都不是“亡国之余”，而是“吴楚之士”：三吴海域充当了蛮荒想象。永嘉南渡以后，三吴本土之人争相效仿南来的

中原人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谓京辇贵大眉，远方皆半额也。”<sup>[41]</sup>这更多显示了江南地方对旧都文化圈衣冠风俗的向慕，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三吴士人一种微妙的心理反应。《抱朴子·审举篇》又说：“江表虽远，密迩海隅，然染道化，率礼教，亦既千余载矣。”<sup>[42]</sup>正是对当时偏见的抗议。南朝相继定鼎建康，三吴海域的“蛮荒”标识自然不复存在。“蛮荒线”乃移向更南的地方，故张融《海赋序》有云：

吾远取荒官，将海得地。行关入浪，宿渚经波。<sup>[43]</sup>

“荒官”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形容官职的渺小、不足以建事功，而是与“远”“海”交织在一起。“荒”“远”“海”三个字几乎可以交相为训。

张融渡海至交州，得以目击真正的南海。但是，他的《海赋》中全然没有充斥在木华《海赋》中的诡怪的事物与氛围。去解释张融《海赋》诡怪因子的缺失，我们当然可以首先假设他是为了要避开木华已有的相关书写。这是合理的。但应当指出，“诡怪”的存在是有条件的，它以神秘为前提。木华创作《海赋》的时候，大约只见过东海，至于西海、北海和南海他都没有见过。他不但写蛮荒，更写诡怪：

若其负稊临深，虚誓愆祈，则有海童邀路，马衔当蹊。天吴乍见而仿佛，蜺像暂晓而闪尸。群妖遘迕，眇眇冶夷……于是舟人渔子，徂南极东，或屑没于鼃鼃之穴，或挂胃于岑岷之峰。或掣掣洩洩于裸人之国，或泛泛悠悠于黑齿之邦。<sup>[44]</sup>

据李善注文，海童这种怪物见于《吴歌》，马衔可以参见陆绥的《海赋图》，天吴见于《山海经》，蜺像见于《国语》，“裸人之国”“黑齿之邦”可以从《淮南子》中找到出处。这些诡怪之物，其来已久。王应麟《玉海》引朱熹说法，谓《山海经》“本依图画而为之，非实纪载此处有此物也”<sup>[45]</sup>。这并无切实依据。朱熹这样说，很可能是宋代儒学精神主格物，因而他要为《山海经》的荒诞提供一个符合经验知识的解释。《玉海》还提到了陆绥《海赋图》。按李善注引陆绥《海赋图》云：“马衔，其状马首，一角而龙形。”<sup>[46]</sup>马衔未见其他典

籍记载，故此倒是可以猜测，陆绥《海赋图》是木华《海赋》的图解，它将《海赋》所涉及的物产、诡怪一一形之于图，附以解说。《海赋》需要配图，意味着文本里的这些怪物很罕见，甚至非经验所有。欧洲中世纪的著述与地图同样充满了大量的“海怪”，真实与传说纷错其间，13世纪神学家托马斯《论海怪》给它们的特征作了很好的概括：罕见、庞大<sup>[47]</sup>。这都带有想象、观念的痕迹，然而以海之深广难测而言，似乎又甚合情理。

木华《海赋》在叙述这些诡怪之物的时候，说道：

徒识观怪之多骇，乃不悟所历之近远。<sup>[48]</sup>

含义与目的是一目了然的。木华企图以我们共有的经验来说服我们：我们所到的地方有限，所见的事物也有限，所以不要惊讶于这些诡怪事物的存在。看来，虽然是关于蛮荒、诡怪的观念，但人们却乐于以经验来论证它的可靠，尽量将观念“合理化”，进而“知识化”。由此，这种源自《山海经》及其他典籍的帝国的“精神图景”<sup>[49]</sup>得以长久存在于国人的视野之中。《文选》李善注反复征引到的《外国图》，很可能就是依据包括《山海经》在内的诸多典籍绘制而成。郭璞《游仙诗》“圆丘有奇草，钟山出灵液”句，注：“《外国图》曰：圆丘有不死树，食之乃寿。”<sup>[50]</sup>鲍照《苦热行》“丹蛇逾百尺，玄蜂盈十围”句，注：“《外国图》曰：杨山，丹蛇居之，去九疑五万里。”<sup>[51]</sup>江淹《杂体诗》“始整丹泉术，终觐紫芳心”句，注：“《外国图》曰：员丘有赤泉，饮之不老。”<sup>[52]</sup>从相关注文来看，《外国图》绝不是实践性的知识。这是典型的“精神图景”，一方面与神仙观念有些关联，另一方面与四海观念、“天下”秩序息息相关。它甚至影响到唐宋时期官方海洋知识的书写<sup>[53]</sup>。当然，这种“精神图景”不独古代中国所有。基督教T-O型世界地图也绝不比宋人的《华夷图》高明，“与其说是地图，不如说是道德”<sup>[54]</sup>。中、西文化的这种类同正显现了人类观念史的一般机制。

并不是任何时候，观念都笼罩知识。木华《海赋》在叙述完种种蛮荒、诡怪之后，以一句“徒识观怪之多骇，乃不悟所历之近远”来作小

结，是想通过生活中的经验知识来推演并加强关于诡怪的观念与想象。这恰恰暗示了经验知识可能还是观念的潜在的“敌人”。相比于蛮荒、诡怪潜藏在礼仪性、制度性的四海观念之下，神仙观念有其不同。神仙观念由来已久，但“海上神仙”的具体塑造，秦汉时的方士扮演了重要角色。《海赋》的结尾有云：

若乃三光既清，天地融朗。不泛阳侯，乘蹻绝往；覲安期于蓬莱，见乔山之帝像。群仙缥缈，餐玉清涯。履阜乡之留舄，被羽翮之縻纒。翔天沼，戏穷溟；甄有形于无欲，永悠悠以长生。<sup>[55]</sup>

很难说木华是不是相信海上神仙的存在。与他相去不远的王粲、庾阐、潘岳在各自的海赋中都没有刻意去写神仙。因此，木华在文章结尾写神仙，可能是出于文章法度，亦即在他这里，神仙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写作，留在最后，故作摇曳。但现存最早的海赋，的确主要是写神仙的。班彪《览海赋》很短，后四分之三的笔墨都留给了神仙：

指日月以为表，索方瀛与壶梁。曜金璆以为阙，次玉石而为堂。萱芝列于阶路，涌醴渐于中唐。朱紫彩烂，明珠夜光。松乔坐于东序，王母处于西箱。命韩众与岐伯，讲神篇而校灵章。愿结旅而自托，因离世而高游。骋飞龙之驂驾，历八极而回周。遂竦节而响应，忽轻举以神浮。遵霓雾之掩荡，登云涂以凌厉。乘虚风而体景，超太清以增逝。麾天阊以启路，辟阊阖而望余。通王谒于紫宫，拜太一而受符。<sup>[56]</sup>

沿及明清，颇有文人加以反讽：

殆海若之幻戏兮，较浮世之绚妍。嗤方士之陋以诞兮，诱秦汉之求仙。侈金银之宫阙兮，或缘此而徧漫。（黄卿《海市赋》）<sup>[57]</sup>

若夫蓬莱缥缈，壶梁拥护。浮山飞来，犹含海雾。知灵岳之参差，洵不可乎胜数。何嬴刘之侈心，竟神仙之果慕。（汪业《拟木广山[川]海赋》）<sup>[58]</sup>

其中，汪业的赋作题为《拟木广山海赋》，故他的这段描写是沿袭了木华《海赋》的格局。可其用意却迥别，乃是讽刺“何嬴刘之侈心，竟神仙之果

慕”。这与赋的讽谏传统相关，但无疑也含着作者的认知。不管海上神仙从信仰退为完全的文学书写是始于何时，它都必然与人们的经验相关：谁也没真正见过长生不老的帝王或方士。经验知识很快就占了上风。

在生活中，以经验知识来摆脱或淡化神仙观念，相对来说是容易的；但依附于“四海”概念之下的方位、蛮荒、诡怪观念，就不那么容易破除。这些观念是总体性的社会文明的投影。正像诺夫乔伊强调的，社会生活中，总是有一些含蓄的或不完全清楚的设定、或多或少未意识到的思想习惯，“这些某地特有的假定，这些理智的习惯，常常是属于如此一般，如此笼统的一类东西，以致于它们有可能在任何事情上影响人的反思进程”<sup>[59]</sup>。观念对于知识的压制是一直存在的，有时候甚至借助于经验、知识为自己作一种脆弱又傲慢的合理化解释。知识的多寡是一回事，人们愿不愿意拿它来检验观念又是一回事。很多时候，暧昧、笼统是最好的状态。更深入地考察这种状态的话，表面上的笼统实际上本身就是一种倾向或选择：那就是一般来说，观念大于知识。但是，所谓“大于”不是一种可见的“>”号，它是隐藏起来的。《海赋》的书写在很多层面上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

### 三 从“海”到“海之上下四旁”： 文章之法背后的知识图景

溯其原始，方位、蛮荒、诡怪与神仙都与海的浩瀚、渺远和难以稽考相关，只能交给观念或想象来填充。在早期的《海赋》创作中，它们会成为书写的“底本”。不过，两晋时关于海的经验与知识已经很可观。班彪《览海赋》还只泛写海浪与神仙，而在木华《海赋》中，知识性的东西变得十分繁富。譬如写物产的这两句：“其垠则有天琛水怪，鲛人之室。瑕石诡晖，鳞甲异质。”<sup>[60]</sup>关于“鲛人之室”句，《文选》注引刘渊林《吴都赋注》曰：“鲛人水底居。”<sup>[61]</sup>人当然不可能真的住在水底。但是，鲛人这种说法的出现，与汉代朝贡、贸易的发达相关：长安的宫廷或贵族从“南夷”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珍珠。这拓

展了汉人的见闻或知识。署名西汉末郭宪的《汉武帝别国洞冥记》有云：“吠勒国……人长七尺，被发至踵，乘犀象之车。乘象入海底取宝，宿于鲛人之室，得泪珠。”<sup>[62]</sup>这种知识掺入了想象，但在某些方面，又持久、真实得惊人。17世纪初，曾受雇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利邦上尉在其日记中记载说海南岛“所有居民都是采珠人”<sup>[63]</sup>。对读《汉武帝别国洞冥记》与《利邦上尉的日记》，竟然没有任何违和感。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记录下了闻见之知。当然，后世赋作中类似“鲛人”的书写仍关联着天朝上国的礼仪观念，比如唐韦执中《海人献冰纨赋》、李君房《海人献文锦赋》、张良器《海人献冰蚕赋》。

过去，批评家对木华《海赋》有自己的看法，方伯海在“尔其枝岐潭淪”处点评道：“上言海，下言泛海，此上下分界处。”<sup>[64]</sup>总评中又说道：“中间分作两段，一从海写，一从泛海写，至于一切岛屿物产，只作补叙，便前后中边无不俱到。故作文必舍易就难，方能出色。骊珠既得，余便可以写写之也。”<sup>[65]</sup>方伯海这里强调的是文章之法。焦袁熹云：“夫人虽竭终身之力，周行数万里，未有能略窥其涯际者也，恶乎而不叹其巨？孟子曰：‘观于海者，难为水。’一言而已矣，欲言其难为水者若何，则有不胜言者矣。而木生者乃援笔而为之赋，其与赋六合者相去几何哉？盖亦难乎其为言矣。”<sup>[66]</sup>焦袁熹着眼的也是文章之法。然而此文章之法实与海的深广难测及社会认知紧密相关。

海涛之外的对象，像海航、海国、海岛、海产等，其书写容有夸饰，却须依赖于相当的见闻或知识。木华能够在写“海”的同时写“泛海”，以合文章法度，是受惠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假如只能写“海”，而无力写“泛海”“岛屿物产”，木华很可能提不起动笔的兴致。而所谓“骊珠既得，余便可以写写之也”，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受限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很难想象，有着铺采摘文、穷形尽相传统的赋体文学会主动放弃大量的描写机会。稽之史志，三国吴人朱应、康泰奉孙权之命“南宣国化”，曾抵达海南诸国，二人分别撰有《扶南异物志》《吴时外国传》<sup>[67]</sup>。此后，同类著述，蔚

为风尚。《隋书·经籍志》史部类著录了139部、1400多卷的地理类著述；仅《文选》注所涉及的地理类著述，汪师韩就考录了99种<sup>[68]</sup>，很多都不见于《隋书·经籍志》。这些著述大量涉及东海、南海，像《东夷传》《珠崖传》《南州异物志》《南越志》《临海水土异物志》《扶南传》等。

知识范畴内的海陆疆域扩张还表现在地图的绘制上，这是一个同样极有说服力的事实。虽然中国的地图绘制非常早，但多是关于墓穴、山川、城邑或局部疆域的。魏晋之际的裴秀则不同，他绘制了覆盖“中国”的《禹贡地域图》18篇，还在序中提出了6种“制图之体”<sup>[69]</sup>，涉及比例尺、方位、倾斜角度等具体问题。制图六体的提出，反映了裴秀追求一种关于疆域的客观而准确的知识。《禹贡地域图》早已亡佚，但揆以情理，应涉及东、南部的海岸线。《三都赋序》提及“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sup>[70]</sup>，尤可以想见当时地图的发达。《文选》李善注还征引了《舆地图》《四海图》等地图。比如，张衡《思立赋》“愁郁郁以慕远兮，越印州而游遨”一句，注曰：“印州，正南州名也。《四海图》曰：‘交广南有印州，其处极热。’”<sup>[71]</sup>没有理由去夸大这些地图的精密性，但足以让我们去想象那个时代的求知风尚与知识储备。

循是而论，在两汉大赋鼎盛的时代，除了班彪《览海赋》等极少数作品而外，并无专门的《海赋》不是没有原因的。或许可以这样说，“海”的知识储备是促成木华、张融大赋体制的《海赋》诞生的重要因素。唐代以后，国人的海洋活动与海洋知识更进一步。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记载了46个与中国进行直接或间接贸易的地方，包括日本、菲律宾、婆罗洲等“海国”，乃至东南亚、印度洋、索马里海岸甚至地中海港口等更偏远的地区<sup>[72]</sup>。前面献疑“四海”的洪迈、程大昌就都是南宋人。这当然会影响到文学创作。清编《全唐诗》中，涉海诗篇达4000余首，严格的“海境诗”则有100余首<sup>[73]</sup>。以赋而论，唐卢肇《海潮赋》就反映了丰富得惊人的海潮知识。宋元以后，更复如此。后世一方面继承典型，状写海的浩瀚、海浪的恣肆等；另一方面或增益更多的活动、见闻，或聚焦于

更细微、更具体的主题。这是木华、张融留下的文章余地，但视角又不能停留于此。王嗣槐《诗论题辞》云：“昔人有为《海赋》者，措思甚苦，或告之曰：子盍从海之上下四旁求之？说诗而得斯旨，亦罕矣。”<sup>[74]</sup>从后世海赋的创作实践看，“海之上下四旁”既出于文章之法，也出于社会知识的增益与积累。

现存海赋，汉至隋仅13篇，唐宋元有33篇，明清则有179篇。先唐时期的海赋，篇题多为《海赋》《沧海赋》《观海赋》《望海赋》，径以“（沧）海”为对象。唐宋以后，继承此类篇题之余，制题又有新的发展：或对“海”的方位、状态等有所限定，比如《南海赋》《曙海赋》《海晏赋》；或旁及“海之上下四旁”，既包括海市、海潮、海日这样的自然景观，也包括广泛的社会生活。（参见下文《历代海赋篇题分析表》）比如，木华《海赋》没有写到煮盐，张融《海赋》写到了，但只有“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sup>[75]</sup>寥寥4句，乃演而为元人《海盐赋》，更演而为清人《煮海赋》《海熬波出素赋》《煮海为盐赋》。再如，木华《海赋》仅写了“候劲风，揭百尺，维长绶，挂帆席。望涛远决，罔然鸟逝”<sup>[76]</sup>等小篇幅的海航、海运活动，竟演而为唐人《海上孤查赋》，更演而为明清人《海上乘槎赋》《浮海赋》《航海赋》及6篇《海运赋》。明人萧崇业《航海赋》开头花了大量篇幅来写造船的过程与出航前的器械、人员配置，“推验天文，审测风日，星医卜算，羽祝庖丁，匠氏缝工，调人司救，象胥掌讶，篆镂丹青”<sup>[77]</sup>悉数在列，有鲜明的纪实痕迹。这离不开明人造船业的发达与海上力量的强盛。

萧崇业《航海赋》不止详写造船，还详述了出使琉球的经过及琉球的地理与风俗。明清时的海赋，具有比较鲜明的写实特征<sup>[78]</sup>，这只是一例。可以说，明清海赋广泛涉及了贸易、朝贡、航海、海运、海防、海战、海军、海产、造船等各个方面。以朝贡为例，明屠隆《溟海波恬赋》云：“若乃岛夷卉服，穷发荒陬。新罗高丽，朝鲜琉球。乌衣黑齿，穿心飞头。海外之国，类千百许。雕题文身，兽形鸟语。天界夷夏，隔绝中土。莫不梯山航

历代海赋篇题分析表<sup>[79]</sup>

| 篇题<br>时代 | “海” |    | “海之上下四旁” |    |       |          |    |        |         | 总计 |      |
|----------|-----|----|----------|----|-------|----------|----|--------|---------|----|------|
|          | 泛称  | 限定 | 自然景观（例举） |    |       | 社会生活（例举） |    |        |         |    |      |
|          |     |    | 海潮       | 海市 | 海日、海月 | 航海、海运    | 筹海 | 煮海（海盐） | 望海楼/桥/亭 |    | 其他   |
| 汉至隋      | 13  | 0  | 0        |    |       | 0        |    |        |         | 0  | 13篇  |
|          | 13  |    | 0        |    |       |          |    |        |         |    |      |
| 唐宋元      | 2   | 9  | 1        | 1  | 7     | 1        | 0  | 1      | 1       | 10 | 33篇  |
|          | 11  |    | 9        |    |       | 3        |    |        |         |    |      |
| 明清       | 20  | 25 | 4        | 21 | 18    | 9        | 4  | 3      | 14      | 61 | 179篇 |
|          | 45  |    | 43       |    |       | 30       |    |        |         |    |      |
|          |     |    | 134      |    |       |          |    |        |         |    |      |

海，间关长征，重译款塞，来朝圣明。”<sup>[80]</sup>这并不是明人的夸语，而是那个时代的记录。郑和下西洋之后，包括埃及、麦加在内的30个国家和地区遣使觐见了明朝皇帝<sup>[81]</sup>。当然，与中国联系最紧密的，还是东南亚海域诸国。仅1400年至1500年这一百年间，爪哇、巴赛、暹罗、占婆、柬埔寨、彭亨、马六甲、文莱、菲律宾就频繁遣使团朝贡，像占婆遣使达60次<sup>[82]</sup>。明郑怀魁《海赋》提及了东南亚海域占城、文莱、琉球、暹罗、菲律宾、柬埔寨等国家。明代的朝贡格局，部分延续到了清代，故张灏《神泉海赋》云：“故大共小球，内歛外附。安南交趾，献琛贡赂。平湖台湾，杭苇朝度。浴日扶桑，贸迁蠹露。尉陀隗器，驰阙若鹭。”<sup>[83]</sup>这应当放在东亚朝贡、全球贸易的视野中来看。就极少数士大夫而言，他们还可能接触到万历间利玛窦带来的新说：“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sup>[84]</sup>利玛窦绘制《山海舆地全图》之余，还依次介绍了五大洲及地中海、红海等海域。只是这类知识还谈不上社会沉淀，因此鲜见吸收。

随着社会海洋知识的增加，木华《海赋》作为经典，成为首先被“廓清”的对象，发难者通常是有出海经历的使者。《航海赋》就批评了《海赋》的浮泛：“木玄虚之所云者，乃想像之言，犹未睹夫灏溔之实际也。”<sup>[85]</sup>康熙二十年（1681），汪楫

出使琉球时，友人施闰章在《送汪舟次检讨册封琉球》中也说：“往来破浪歌兰棹，《海赋》玄虚将见嘲。”<sup>[86]</sup>嘉庆时人李梦松则在其《浮海赋》中，抱怨“昔传海多怪异，骇人见闻……危乎险哉，至于如此。耸闻有言，乃今不尔”<sup>[87]</sup>，列举的“怪异”很多都来自木华《海赋》。李梦松曾游幕广东，这篇海赋可能作于航行南洋一带之后。嘉庆末，广东举人杨炳南给《海录》撰写序言时，也强调历来文人记载海外作品“华而鲜实”<sup>[88]</sup>，不曾像谢清高这样游历四海。清末邱炜萋更将《海赋》及其同类作品视作“浮夸失实”<sup>[89]</sup>的代名词。当然，也有借着西学或理学加以议论的，比如乾隆间人倪思宽已经听说过“地圆之理”，还试着对《甘泉赋》“漂龙渊而还九垓兮，窥地底而上回”作出相应的阐释，又援引朱熹之论，抱憾于木华《海赋》“未曾发明”<sup>[90]</sup>出海与天接的道理。他们实际是以个人经验、社会知识来审视《海赋》与同类作品的书写。

在朝贡体系的海航实践中，海洋知识的积累与反拨仍是有限的。明清之际，可靠知识的范围大抵在南洋海域及其周边，近年发现的明末华商航海图（The Selden Map）就是一例。真正拓展了知识，并把知识推到一个神圣的位置上，是中国被卷入万国体系以后的事。这时，士人阅读的不再是《天下图》《职方图》《四海图》，取而代之的是《万国舆图》《五大洲各国统属图》《海道图说》。他们不

断更新着自己的地理知识，海赋创作也透露出很多时代信息。俞樾早年在其《海运赋》中批判古代“《海图》之诡诞”“《海赋》之纷纶”<sup>[91]</sup>，肯定“海运与河运相济，不可偏废”<sup>[92]</sup>。这是相当自觉的海上意识。与明代屠隆《溟海波恬赋》、郑怀魁《海赋》、王廷禄《筹海赋》<sup>[93]</sup>、米万钟《招宝山阅兵观海赋》等赋作聚焦于海东“倭患”不同，晚清士人面对的乃是越洋来犯的“列强”。谭宗浚《览海赋》仍未摆脱华夷观念，但他实际意识到海洋之险已不足以“别远夷”“闲远裔”<sup>[94]</sup>。1885年，清政府立海军衙门，编设水师舰队，便是对万国体系的一种实际回应。这催生了胡薇元的《海军赋》，小序提及天子“爰设海军，以资拱卫”<sup>[95]</sup>，赋文云：

或离或合，或标或箭，或翕而张，或奔而殿，或屡进若列墙，或交锋如骇电，虽《长杨》《羽猎》之俦，曾不足以喻其雋逸……天颜有喜，殊锡恩覃，转六龙之馭，回八骏之骖，愿巩固于西北，恒瞻视于东南。<sup>[96]</sup>

这里描写的是蒸汽时代的军舰，《长杨赋》《羽猎赋》里盛夸的水师完全“不足以喻其雋逸”。而所谓“愿巩固于西北，恒瞻视于东南”指的是晚清西北边疆、东南海域同时面临的来自西部列强的压力。这些海赋多少带一点全球视野。

知识、武备而外，改变得更剧烈的则是观念。晚清的最后二十年，正是西方人文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盛行之时。这些地理学表面上提供了种种科学的知识，譬如四大洋、五大洲等。但是内里却潜藏着很多观念，而地理环境决定论就是其中一种，它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在地理学上的体现，为帝国主义的世界统治提供了一个自然主义的解释<sup>[97]</sup>。较早介绍这种学说的梁启超在《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中就声称：“均是土地也，均是人类也，而文明程度之高下，发达之迟速，莫或相等者，何也？英儒洛克曰：地理与历史之关系，一如肉体之与精神。”<sup>[98]</sup>在论述“海滨”的时候，梁启超进而呼喊：“以海岸线论，则欧罗巴为五洲之冠。此其于文明程度，有大关系焉。”<sup>[99]</sup>于是愚昧或野蛮，悄然落在了东亚大陆的版图上。美国的马汉就设想英美应该联合起来控制中国的海域，以便使中

国接受“教化性影响”<sup>[100]</sup>。更为讽刺的是，就在梁启超及其同道们高呼东亚的重要性的时候，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在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了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讲演，最后说道：

综上所述，可以很明确地指出，俄国对这片内陆地区的控制为某个新的力量所取代，并不会降低这个枢纽位置的地理意义。例如，若是中国被日本组织起来去推翻俄罗斯帝国并征服它的领土，就因为它们把巨大的大陆资源与面向海洋结合在了一起（这是占据了枢纽地区的俄国至今尚未攫取的有利条件），就有可能构成威胁世界自由的“黄祸”。<sup>[101]</sup>

看上去麦金德仅仅是强调了中国海域的“有利条件”，所得的结论也与梁启超及其同道们中国盛衰关系到地球全局的说法相似。但“就有可能构成威胁世界自由的‘黄祸’”一句却将原本深藏不露的东西暴露了出来。麦金德本人是位学者，他提供的是有关“心脏地带”的政治地理学知识，就像他自己说的，他“是以一名地理学家的身份来讲这番话的”<sup>[102]</sup>。唯其如此，才发人深省——当晚清士人们以全新的地理知识来铲除种种“四海观念”的时候，他们接受的真的就仅仅是科学知识吗？显然不是。海洋与陆地、文明与野蛮的区隔已暗藏其中。

历代海赋的海洋书写，除了记录知识而外，还掺杂着观念——既包含着礼仪性、制度性的表征了华夷秩序的“四海观念”，也包含着其他由海的复远微茫所衍生的想象。知识与观念交错纵横，共同构成了海赋的“底文”。观念常常表现得唯我独尊，即使它与认知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紧张或缝隙。不能说，仅仅因为海赋是一种文学创作，所以作者不在意这种紧张或缝隙。事实更可能是，作者不是不在意，更多的情况是根本就不会设想或没有意识到这种紧张或缝隙。这种笼统正体现了一种极其深刻、幽眇的观念史或思想史机制。尽管应当承认，在海洋书写中，相对于观念或想象，线型的知识反拨史确实存在，但当晚清士人认为知识的神圣与科学足以驱除荒谬的四海观念时，一种新的换了中心位置的四海观念却依附所谓知识，夤缘而来。木华《海赋》所谓“何奇不有？何怪不储？芒芒积流，含形

内虚”<sup>[103]</sup>，不啻是一种寓言。观念来源多途，其中一途是来自于某种知识，哪怕是最低级的经验知识，但在后来的混沌交融中，情况变得复杂。知识与观念从未泾渭分明过。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知识就像一片大海，而观念才是其“茫茫积流”。

[1] 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参见谭家健《汉魏六朝时期的海赋》，《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赵俊玲《〈文选〉江海赋发微》，《中州学刊》2010年第4期；王允亮《汉魏六朝江海赋考论》，《北方论丛》2012年第1期；刘立馨、冷卫国《明清海赋反映的海洋文化》，《东方论坛》2012年第3期。

[2][56]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汪绍楹校，第152页，第1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3][8][13][39][44][46][48][50][51][52][55][60][61][70][71][76][103]《文选》，萧统编，第179—180页，第181页，第180页，第180—181页，第181页，第181页，第181页，第308页，第403页，第454页，第182—183页，第182页，第182页，第74页，第216页，第181页，第183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4] 王世贞：《艺苑卮言》，《历代诗话续编》，丁福保编，第99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5][6][14][64][65] 于永光：《重订文选集评》卷三，页一a、页一b，页一b，页一b，页二a，页四b，乾隆四十三年（1718）刻本。

[7][9][23][25][33]《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册，阮元校刻，第313页、第319—320页，第311页，第282页，第296页，第323页，中华书局2009年版。

[10][11][12][16][18][19][21][43][57][75][77][80][85]《历代赋汇》，陈元龙编，第102页，第101页，第102页，第102页，第103页，第661页，第102页，第101页，第106页，第102页，第736页，第105页，第736页，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

[15]《马融传》，范曄：《后汉书》，李贤等注，第1966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17][20] 卢琦：《圭峰集》卷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4册，第736页，第736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2] 柳宗元：《柳河东集》，第3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4]《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第3册，阮元校刻，第3533页，中华书局2009年版。

[26]《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第5册，阮元校刻，第6008页，中华书局2009年版。

[27][67] 参见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9—24页，第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28][29][30][31][32] 徐坚：《初学记》，第114—115页，第115页，第114页，第114页，第115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34] 洪迈：《容斋随笔》，第2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35] 程大昌：《北边备对》，《全宋笔记》第4编第8册，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第124页，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

[36] 李约瑟：《中国之科学与文明》第6册，陈立夫等译，第13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37] 参见诺曼·罗思尔《地图的文明史》，陈丹阳、张佳静译，第40—41页，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杰里·布罗顿《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林盛译，第98—9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38]《方輿汇编·山川典·海部》，《古今图书集成》第207册，陈梦雷编，蒋延锡校订，第46页，中华书局1934年版。

[40] 刘义庆：《世说新语校笺》，徐震堃笺，第45—4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41][42] 葛洪：《抱朴子》，第246页，第2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45] 王应麟：《玉海》，《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3册，第348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47] 参见切特·凡·杜泽《海怪：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地图中的海洋异兽》，王绍祥、张愉译，第6—7页，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

[49] 参见 Vera Derofeeva-Lichtmann, “Mapping a ‘Spiritual’ Landscape: Representation of Terrestrial Space in the Shanhaijing,” in Nicola Di Cosmo and Don J. Wyatt(eds.), *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35-79.

[53] 参见黄纯艳《中国古代官方海洋知识的生成与书写——以唐宋为中心》，《学术月刊》2018年第1期。

- [54] Valerie Flint, *The Imaginative Landscap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 Princeton, New Jersey, and 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7.
- [58]《赋海大观》第2册, 鸿宝斋主人编, 第13页,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
- [59] 诺夫乔伊:《存在巨链: 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 张传有、高秉江译, 第9页, 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 [62] 郭宪:《汉武帝别国洞冥记》, 刘歆等:《西京杂记(外五种)》, 第58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 [63] 蔡香玉:《荷法文献中的中国南方沿海地区》,《西文文献中的中国》,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 第106页, 中华书局2012年版。
- [66] 焦袁熹:《此木轩杂著》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136册, 第483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 [68] 参见汪师韩《文选理学区輿》卷二上,《续修四库全书》第1581册, 第22—25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 [69]《裴秀传》, 房玄龄等:《晋书》, 第1040页, 中华书局1975年版。
- [72][81] 参见林肯·佩恩《海洋与文明》, 陈建军、罗焱英译, 第364页, 第374页,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 [73] 参见《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上卷, 曲金良主编, 第745—747页,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 [74] 王嗣槐:《桂山堂文选》卷三,《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3册,《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 第145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 [78] 参见滕新贤《沧海钩沉: 中国古代海洋文学研究》, 第229—231页, 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版。
- [79] 本表据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制作。说明: 1. 本表中的“海赋”指一切与海密切相关的赋作。2. 本表依据篇题分类, 而非篇旨或篇意, 是为了设定相对可循的标准。3. “海·泛称”, 是指沿袭先唐旧题。4. “海·限定”, 是指以一定条件的海为对象, 包括: 方位限定、状态限定、其他限定如《江汉朝宗于海赋》等。5. “海之上下四旁”, 是指与海密切相关的自然景观、社会生活, 以及关于海的寓言、神话等。6.《历代辞赋总汇》的漏收, 笔者对《总汇》篇目的漏看, 以及笔者虽未漏看、但在斟酌去取上有疏忽, 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对海赋数量的统计。
- [82] 参见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 1450—1680年》第2卷, 吴小安、孙来臣、李塔娜译, 第16—17页, 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 [83] 周硕勋:《潮州府志》卷四十二, 见《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24册, 第1067页,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 [84] 利玛窦:《坤輿万国全图》,《利玛窦中文著译集》, 朱维铮编, 第173页,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 [86] 施闰章:《施愚山集》第2册, 第446页, 黄山书社1992年版。
- [87]《历代辞赋总汇》第12册, 马积高主编, 第11571页,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 [88] 杨炳南:《海录序》, 谢清高:《海录(附三种)》, 第7页, 岳麓书社2016年版。
- [89] 邱炜菱:《五百石洞天挥麈》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708册, 第130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 [90] 倪思宽:《二初斋读书记》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156册, 第589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 [91][92]《历代辞赋总汇》第18册, 马积高主编, 第17916页, 第17915页,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 [93] 王廷禄为明人,《赋海大观》误作清人,《历代辞赋总汇》沿其误, 将《筹海赋》编入清代卷。
- [94] 谭宗浚:《希古堂文集》乙集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564册, 第351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 [95][96] 胡薇元:《玉津阁文略》卷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73册,《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 第245页, 第246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 [97] 参见 Richard Peet, “The Social Origins of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75, no.3(1985), pp.309-333.
- [98][9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4册, 第964页, 第967页, 中华书局2015年版。
- [100] 弗朗西斯·塞姆帕:《学报版引言》, 阿尔弗雷德·赛尔·马汉:《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范祥涛译, 第40页, 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
- [101][102] 哈尔福德·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 詹姆斯·费尔格里夫:《地理与世界霸权》, 胡坚译, 第344页, 第343页,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马勤勤